

安东尼·吉登斯 著
李俊青 译
昆仑出版社

Shijie
Zhuming
Zhexuejia
Xiaozhuan
CongShu

Fontana Modern Masters
DURKHEIM Anthony Giddens

杜尔凯姆

世界著名哲学家小传丛书



· 世界著名哲学家小传 · 丛书

杜尔凯姆

安东尼·吉登斯 著
李俊青 译

昆仑出版社

图字:军—1998—038号

原文书名:Durkheim
原文作者名:Anthony Giddens

Durkheim:Fontana Modern Masters
Copyright 1978 by Anthony Giddens
Chinese(Simplified Characters)

Trade Paperback copyright ©1999 by Kunlun Publishing House
(Kunlun Chu Ban She)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 ,UK
Though Arts & Licensing International, Inc. ,USA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杜尔凯姆/(英)吉登斯(Giddens,A.)著;李俊青等译.—北京:昆仑出版社,1999.1
(世界著名哲学家小传丛书)
ISBN 7-80040-354-8

I. 杜… II. ①吉… ②李… III. 杜尔凯姆,E.(1858~1917)传记 IV. B565.49

昆仑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白石桥路42号 100081)

电话:62183683

北京朝阳区仰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年1月第1版,1999年1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3.125

字数:60千字 印数:1--5000

定价:5.00元(膜)

关于作者

安东尼·吉登斯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院的主任。从1985年到1996年任剑桥大学社会学教授；自1969年至1996年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研究会成员。

安东尼·吉登斯的著作包括：《资本主义和现代社会理论》（1971）、《马克斯·韦伯的政治学思想》（1972）、《现代社会的阶级结构》（1973）、《社会学方法的新原则》（1976）、《社会政治制度：部门相互联系理论纲要》（1984）、《社会理论与现代社会学》（1987）、《社会学》（1989）、《现代性与自我特性：后现代时代的自我与社会》（1991）、《性关系的转变：现代社会中的爱情、性别和性欲》（1992）、《社会学方法的原则》（1993）、《超越左倾和右倾》（1994）、《为社会学辩护》（1996）。

序 言

爱弥儿·杜尔凯姆的著作对现代社会思想的发展有着巨大的影响。在他的一生中，他把许多给人深刻印象的有才之士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许多学科领域里的人们吸收了他的社会学观点，例如，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里的哈伯韦茨、毛斯和德维；政治经济学领域的塞米安得和布尔根；考古学领域的休伯特；汉语研究的格兰尼特；语言学领域里的索绪尔。在法国，杜尔凯姆学派的影响力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冲击在很大程度上被逐渐削弱了，但在大战期间，哈伯韦茨和毛斯一直在坚持杜尔凯姆所创立的思想传统，并成为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自二战以来，杜尔凯姆在法国社会思想界的声望降低了。另一方面，他的思想观点，尤其是通过对皮尔格特和利威·史特劳斯著作的影响，对“结构主义”的兴起产生了一定的作用，而结构主义在当代法国或多或少占有突出的地位。

在讲英语的国家和地区，杜尔凯姆逐渐被认为是“结构主义”的主要创始人。在他去世之前，社会学界的英语学者熟知他的著作，然而，其著作多半没有得到共鸣。杜尔凯姆最后一部主要著作《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是他在世时惟一一部用英语写的著作。杜尔凯姆最初在英国人类

学界有影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拉德克利夫·布朗努力的结果。拉德克利夫·布朗把杜尔凯姆思想的要义融入到自己的著作中。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期间，他还致力于在美国传播杜尔凯姆的思想。由于一些学者的著作，如唐科特·帕森斯和罗伯特·克·默顿的著作，使杜尔凯姆的思想得以进一步的传播。现今，杜尔凯姆在美国的影响可能比在其它任何地方都要大。

在此书相对有限的范围内，我将努力对杜尔凯姆的著作作一综合描述。和一些其他解释相比，我试图阐明杜尔凯姆著作极强的连贯性。对他所提出的社会学观点，同时，我也注重介绍他有关政治观点。现在这一社会学观点被认为有很大缺陷。最后一章，我会阐明一些个中原因。

目 录

序 言	(1)
生平介绍	(1)
1、早期著作：《论社会分工》	(11)
2、社会学方法及其在《论自杀》中的应用	(21)
3、国家与政治	(33)
4、道德权威与教育	(44)
5、宗教与认知理论	(57)
6、批评性评论	(73)
杜尔凯姆主要著作书目摘要	(88)

生平介绍

像其同代人德国著名的马克斯·韦伯一样，杜尔凯姆并不是一位百科式的思想家。在他一生的学术生涯中，他更致力于不懈地解决有限的几个问题。这给他的著作增添了智慧的力量。一般说来，这些容易被阐明。杜尔凯姆给自己制定的一个任务是完成他的前辈孔多塞、孟德斯鸠、孔德作品中他认为他们首创的努力：在经验主义的基础上确立社会学。虽然这些先辈们把社会自然主义研究的思想观点制定成

规划，在杜尔凯姆看来，他们并没完全摆脱历史哲学观去具体实现这一规划。杜尔凯姆维护孔德的观点，即强调社会学作为一门与众不同的研究领域的自主性和努力展示其在经验调查中的应用。

杜尔凯姆第二个关注的是如何对待现代社会中个人主义兴起的重要性问题。如果说马克斯·韦伯作品的社会政治背景是一场失败的革命（1848）和德国政体缺乏开明中心的话，那么，杜尔凯姆的时代背景则是一场成功的革命（1789），虽然这场革命成功得并不彻底。也就是说，这场革命所宣称的自由个人主义的理想似乎和 19 世纪法国现实有着很大的距离并一直受到右派顽固势力的坚决抵制。这些人把个人主义看作是一种疾病，是一种文化结构衰败的同义语。在他的第一部主要著作《论社会分工》（博士论文）中，杜尔凯姆竭力论证这类不实之词的徒劳无益；个人主义理想表明了一种新的社会秩序的出现，这一新的社会秩序将不断超越保守派所维护的传统社会形式。

杜尔凯姆贯穿始终的第三个主题是对道德权威的本质和根源的吸收。在《论社会分工》中，他关切地表明以“有组织的团结一致”为基础的新型社会形式的出现，即使这种新的道德秩序与旧的道德秩序存在着根本的区别，仍然应该包括社会关系的道德化，所以，他着手开始批评那些希望重新回到已过时的道德秩序中的保守派社会哲学家，和那些认为新社会能够而且应该纯粹建立在兑换交易基础上的功利派自由主义者。“孤立的个人”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得个人利益而形成了交换关系。杜尔凯姆认为，“孤立的个人主义”这一概念，其本身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是以道德秩序为前提的。在杜尔

凯姆的格言中，有一句“契约中的非契约性因素”，即契约交换的存在是以道德权威为前提的，这种权威使契约具有约束力。

最后，杜尔凯姆的著作表明他对社会科学知识的现实含义有着自始至终的极大兴趣。在这点上，他的观点在他死后的著作解释者中，甚至在那些愿意接受他的绝大部分其他思想的人们中，从来没有受到特别的欢迎。然而，这些观点在他的思想体系中处在中心位置，无视这些观点，人们就不会充分理解杜尔凯姆在其主要著作中所探索的思想。杜尔凯姆认为，社会学家的实际作用与医生的作用相似：医生运用科学发现来区别疾病和健康，来诊断疾病的起因和找到治疗的方法。《论社会分工》的宗旨之一恰好是：说明个人主义理想的传播并不是疾病的象征，恰恰相反，是正在形成中的与社会休戚相关的社会变迁正常和健康的反映。这是杜尔凯姆一直坚持的“诊断”，即使他后来开始对他最初确切陈述过的某些方面感到不满。

杜尔凯姆的一生是在法国和欧洲历史中的危险阶段度过的。他于1858年4月15日出生在法国洛林的厄比纳尔市，卒于1917年。他经历了1870年至1871年间发生的法国——普鲁士战争法国失败的战后余殃和巴黎公社的血腥事件。他一生最后几年被更广泛的冲突蒙上了阴影。冲突使整个欧洲都陷了进去，并威胁要毁灭此间法国所取得的社会和经济进步。杜尔凯姆有犹太人血统，生长在一个正统的家庭；他父亲是一个犹太教教士。杜尔凯姆曾一度准备子承父业，不久后进入了犹太法学学校。虽然他决定脱离这种家庭传统，并声称自己是个不可知论者，但他接受的早期教育和他家人那种节

俭和自律的生活对他人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对杜尔凯姆早年生活的一份权威资料的描述中，乔治·德维说：“在与他说富有倒不如说简朴的家庭里，大人們的口头训诲和以身作则教育他遵守法律，培养了这个年青的洛林人一些根深蒂固的品质：轻视懒惰，蔑视不劳而获，厌恶没有真凭实据的任何事。”

18岁时，杜尔凯姆去了巴黎，为进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学习作准备。在竞争激烈的考试中，他两次入学考试都失败了，但第三次努力成功了。在巴黎，他是一群卓越的知识分子中的一位，他们中有几位对法国的文化生活和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柏格森和饶勒斯比杜尔凯姆高一年级，珍妮特和布鲁诺特也和他们同学。杜尔凯姆的兴趣很快确定在社会和政治哲学领域里。德维认为，从一开始杜尔凯姆就认为所有的哲学体系都应该有其直接的实际含义，他尤其敌视那些吸引一些同代人的被他认为是肤浅的智力炫耀。而其中的一些同代人反而认为他太过于认真和严肃。在巴黎，杜尔凯姆形成了他后来一生都坚持的政治观和对待政治的一般态度。虽然面对拥护君主制度者和天主教右派的反动舆论，他极力赞同共和体制和循序渐进的社会改革，但他总是回避“政治阴谋”，宁愿在总原则基础上来讨论政治。后来杜尔凯姆对他在巴黎受到的教育持批判态度，虽然承认那种紧张的学术气氛的激励作用，但抱怨对发生在心理学和其它人类学科领域里的科学进步知之甚少。在他未成年时，他受布鲁诺特和菲斯泰尔·德·库朗热著作的影响。他们是他在巴黎的老师（后者于1880年成为学院院长）。在布鲁诺特的指导下，他仔细阅读了孔德的著作，但是他也对康德主义的哲学产生了兴趣，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研究了新康德主义社会哲学家雷诺尔的著作。康德哲学观经常出现在杜尔凯姆的著作中，并且在《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他终于努力把“社会学康德主义”作为一门知识理论井井有条地列了出来。雷诺尔的哲学对共和派改良主义者有很大的影响，杜尔凯姆继承他的一些重要观点。雷诺尔强调开启科学比较道德研究的重要性，认为科学决定论是和道德行为的自主性相一致的。他提倡通过国家行为和长期教育计划的协调合作来实现自由主义理想。

大学毕业后，杜尔凯姆从1882年到1887年间在几所省级公立中等学校讲授哲学。在此期间，他在德国度过了1885—1886学年，学习德国社会哲学的新发展和“集体心理学”。从德国回来后，他写了两篇有关德国社会思想界主要人物的长篇评论文章。在德国的逗留使得他巩固了正在形成中的思想体系，并把自己的注意力更明确地集中在自己的思想体系中。正像他后来所说的，在德国学到更明确的“社会现实意识、社会有机复杂性和发展意识”。在到德国之前，他已经开始初步构思后来命名为《论社会分工》一书了，并逐渐认识到对他早些时候描述过的“个人品格与社会团结的关系”的研究要采取适当的社会学方法。在19世纪的后几十年中，随着孔德作品的声望每况愈下，被孔德所杜撰出的“社会学”这个术语已经名誉扫地，杜尔凯姆有些不情愿地采用了这个词（他后来称之为“不规范的新词”），并承认孔德的阐述有些不够准确。所以，在他一边准备博士论文材料的同时，他就一边致力于研究社会科学中的方法论问题。

杜尔凯姆关于德国社会思想的文章帮助他于1887年在

波尔多大学找到了一份工作。这份社会学和教育学讲师一职是为他特设的，这部分归因于路易·利奥德的影响。路易·利奥德是法国高等教育局局长，对杜尔凯姆拥护共和制表示赞赏，他自己也是雷诺尔的追随者。同年，杜尔凯姆结了婚，并在波尔多居住了15年。这是他一生中最有成效的时期。在他的就职演讲中，他对社会学前景作了简短的描述：社会学是一门新兴的科学。与其抽象地争论其可能性，不如我们讨论如何启动具体的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这种研究能适合于阐明传统的哲学问题，并在强调实验的基础上来重新改造后者。例如，他主张这同样适用于道德或伦理问题。在我们希望解决应该如何表现得很道德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应该首先把道德现象看作为“自然现象的体系”来进行科学研究。他总结说，这个任务是当今时代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传统价值观的道德地位已被削弱；我们必须调查正在出现的道德权威的根源和说明它们是与个人利己主义相抵触的。他的观点很有影响力：社会学的影响不但能使哲学而且能使历史和法律等其它附属学科获得新生。

《论社会分工》写于1893年。杜尔凯姆还按照法国博士学位所需的程序，用拉丁文写了一篇关于孟德斯鸠的辅助性论文。杜尔凯姆在他论文的公开答辩中，他不得不对付考试者们提出的很挑剔的评论：布鲁诺特就是其中之一，这部著作是杜尔凯姆献给他的。布鲁诺特对这篇论文的主张持很大的保留态度。杜尔凯姆对这些批评作了强有力的回击。对许多人来说，他考试的成功似乎是社会学对在哲学中更反动的主张的胜利，正像一位现代记者所评论的，社会学“获得在索邦被报道的权利”。杜尔凯姆把社会学作为主要社会科学学

科的扩大论主张，使得他在波尔多和巴黎赢得了同样多的敌人和朋友。在他的博士论文答辩的交换意见中，他第一次遭遇许多批评家，他们反对杜尔凯姆的大部分或全部的社会学观点。在巴黎最终获得一职位之前，杜尔凯姆被迫一直呆在波尔多。这整段时间里，他的观点招致了知识界和政界的反对。《社会学方法的规则》一书的出版（该书是他1894年写的系列文章，第二年以书的形式出版），不出杜尔凯姆所料，激起了进一步的论战。他故意把这部论著作为公开的社会学宣言。

继《规则》一书后，他于1897年写了《论自杀》。在这本书中，杜尔凯姆想通过把社会学方法运用于解决具体的实际题材来说明他的社会学方法含义的有用性。他从前也发表过一篇关于自杀的统计文章，他研究这一问题连同他的其它著作花费了十年多的时间。在波尔多时，杜尔凯姆举行过许多学科的讲座：关于教育、家庭、宗教和社会主义的历史。他在1895—1896年教授社会主义历史课程，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回应那些受了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生的要求。在他访问德国期间，他第一次直接接触到马克思的著作，尽管他以前从未系统研究过。到他开始研究马克思作品的时候，他的大部分基本观点已根深蒂固地形成了。在他明显很受学生欢迎的讲座中，他努力把马克思主义的起源和社会主义思想更广泛地融入到自己的思想体系中。一些批评家认为他对社会主义的态度自相矛盾，其实他的态度很明了并且始终如一。他不赞成革命马克思主义，认为革命所带来的变化很小：深刻的变化总是长期社会发展的结果。另一方面，他更倾向于变革社会主义。他认为变革社会主义符合他的循序渐进的社会

重建理想。他反对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手段（17页）这一论点。对他来说，恰恰相反，国家能够而且应该通过扩大机会平等成为实现社会变革的工具。除了两本写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分析德国军国主义起源的小册子外，他出版过的惟一部关于政治的著作是围绕德雷福斯案的一场公开辩论而写的。该文章的特点是深奥抽象，它是为回答普鲁尼蒂尔的辩论写的。普鲁尼蒂尔是一个保守派反德雷福斯者，他诬蔑那些努力向德雷福斯案提供支持的知识分子的作用。认为他们无视传统的政权机构和支持个人主义与无政府状态。作为这样的知识分子的一员，杜尔凯姆努力对根源于他的社会学观点的“个人主义”予以解释，并驳斥“个人主义”包含无政府状态的观点。事实上，在杜尔凯姆的所有著作中，他的立场在这篇文章里表达得最清楚。他解释道，我们必须区别如下概念：一方面是实用主义和古典政治经济所提倡的个人主义观点，另一方面是由于社会发展而产生的道德个人主义理想。第一种是建立在孤立主义这一概念上的，个人通过与其他人形成交换关系而创立社会，这种观点确实是和社会个人利益的相互作用这个论题有关联的。但是，表达了一种特定哲学的这一论题完全不同于杜尔凯姆有时称之为“个人时尚”的道德理想之一的个人主义。道德个人主义反对无政府自我利益；它并不美化个人，但恰恰相反，它遵循在现代社会里成为社会团结基础的惟一道德价值观——自由和平等。

在《论自杀》出版的同年，杜尔凯姆帮助创办了著名的评论刊物《社会学年鉴》，从此他花了很多时间忙于这本刊物直到由于战争爆发刊物被暂停出版。虽然从一开始该刊物的方针是百花齐放，但由于一群核心作者的努力，该刊物的出

版对杜尔凯姆的社会学成为公认的思想“学派”作出了很大贡献。《年鉴》的目标是很远大的：对社会学文献和经济学、人口统计学、地理学、伦理学和法律专业等社会科学方面的著作提供综合的年度评论。该刊物也承担出版时势专论和论文（杜尔凯姆写的几篇重要作品就发表在该刊物上）。《年鉴》尤其重视有关宗教社会学方面的文章。在职业生涯的后期，杜尔凯姆越来越把他的兴趣转到宗教社会学上。根据他自己的陈述，他在1894年到1895年期间主要阅读了英国和美国人种学者的著作，这对他兴趣的转移起着主要作用。杜尔凯姆在波尔多教授一门宗教课程时，第一次读到了这些学者的著作，随后就在《年鉴》上对其中的一些著作发表了书评。他后来评论道，“1895年度那门课程标志我思想发展中如此大的转变，以至于不得不重新继续我以前所有的研究，来使其符合这些新见解”。

他的新见解最终体现在《论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中。但同时，在1902年，他又应聘到索尔蓬纳学院教授教育学，尽管直到1906年他才成为那儿的一名教授。他最初教授的是教育学而不是社会学。所以，最初他不情愿在这方面晋升。直到1913年他才在“教育学与社会学”专业谋得教授一职。杜尔凯姆的前任布森在任职公务员期间，对促进法国教育的世俗化起到了切实重要的作用。作为其主要职责之一，杜尔凯姆负责讲授法国教育理论和历史。在讲授这门课程中，他对同样的理想给予了学术上的支持。对文理科中参加会士考试的所有学生，这门课是必修的。通过这门课，杜尔凯姆设法进一步扩大他的思想的影响力。他的社会学和当局的共和论意识形态是那么相辅相承，以至于一些当代批评家对教育界的

“杜尔凯姆主义情势”的广泛影响力颇有微词。

然而，这些教学任务和《年鉴》刊物的重负，妨碍了杜尔凯姆对宗教研究工作的进展。《基本形式》直到1912年才出版。随着1914年战争的爆发，他投身于争取战争胜利的努力中，继续教书的同时还参加了许多委员会的活动，关心有关战争的文章和书的出版等其它事情。他的健康状况越来越差，由于他的惟一儿子安杰尔在1915年—1916年间从塞尔维亚撤退中的牺牲，无疑加速了他59岁的早逝。安杰尔很早就显示出其聪明才智，在充满青春朝气的《年鉴》群体成员中，他已崭露头角。杜尔凯姆无比悲痛以至于有一段时间无法工作。他逐渐恢复了耗时费力的各项工作，但临近1916年底患了中风。虽然身体有所恢复，但从此体态虚弱，死于1917年11月15日。

杜尔凯姆论著的大部分，包括绝大部分他为许多课程所写的讲义，是在他死后出版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两篇教育研究文章：《道德教育》和在索尔蓬纳学院写的关于法国教育制度历史的讲义《法国教育学的演变》上、下两卷；在波尔多时，关于社会主义的讲义、关于公民政治和国家的讨论；以及按学生的笔记重新整理的关于实用主义哲学的分析。